

民国时期河南百泉庙会市场初探

丁德超

(嘉应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 要:明朝初期百泉庙会开始兴起,清朝初期百泉庙会市场开始以药材作为其主要的交易商品。民国时期百泉庙会兼有基层市场和药材集散中间市场的双重职能,这种典型的庙会市场特征在庙会的会期安排、组织结构、市场布局、交易品种、交易方式等方面均有所反映。百泉庙会市场的兴盛带动了周边乡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农民的商品市场意识,扩大了跨省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总之,百泉庙会市场是河南区域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近代河南市场网络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 键 词:民国;百泉;庙会市场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5)01-0043-05

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1]。目前史学界基本认同:庙会大致出现在魏晋时期,唐代已基本定型,宋代以后,庙会在城乡间得到普遍发展。庙会与乡村社会发展密不可分,至今仍长盛不衰。因此,庙会研究已成为目前农村市场和民间信仰研究领域所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庙会的研究,肇始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庙会研究重新被学者纳入了研究视野,他们继承前辈的研究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取得了累累硕果^①。有鉴于学术界对于庙会的商品交易功能、各省区庙会发展的不同形式,庙会经济对乡村社会渗透的深度与广度均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拟对民国时期百泉庙会市场进行全方位的深入考察。

一、百泉庙会的缘起

百泉位于河南北部太行山下,辉县西北 5 里,东距卫辉 50 里,东南距新乡 40 里,为卫河(卫河经天津入海)的源头,故亦称卫源。据唐武后长安四年(704)卫源庙《百门陂碑铭》,“泉流百道”^②,故叫百

泉。百泉,为辉县一个普通小乡村,其主要街道为南街,自东迤西,长约半里,接于东街之南段路西;东街长约 1 里半,由南至北,止于苏门山麓之荒郊。

百泉庙会主要有天爷会和药材大会两种形态。天爷会,亦称蟠桃会或无梁庙会,本为乡民向无梁庙进香祈祷的神会,会期为农历三月初三,大会仅有 1 个日正会。庙建于明代,会起于何时不得而知。1927 年冯焕章为破除迷信,将无梁庙中的王母诸神完全捣毁,虽然神去庙空,但天爷会的庙会市场依然保存至今。药材大会,亦称四月会,正式会期为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十,如将会前筹备及会后绵延的时间加上,约有 1 个月之久。药材大会起源于隋朝报答卫源神的公德,修建卫源庙,因有祭祀活动,人多聚集,大会随之兴起。唐朝尊信佛教,到处建庙塑像,提倡庙会。据《劝佛经书》所说,四月初八是释迦牟尼佛祖诞辰,十万诸佛,皆在这天享祭。从此,每年农历四月初八就成了百泉的定期庙会。明朝百泉庙会开始得到官方支持,卫源庙石柱上载“明洪武八年御祭于四月朔八日,令起大会,以报神功”^{[2]6},从此百泉庙会规模开

收稿日期:2014-08-19
基金项目:2014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4DLI5)
作者简介:丁德超(1980—),男,河南许昌人,嘉应学院社会科学教学部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全汉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载《食货》,1934 年第 1 卷第 2 期;从治湘:《北京汴京集市庙会概况》,载《工商半月刊》,1945 年第 2 期;[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的村市和庙市》,载《东洋学报》,1961 年第 44 卷第 2 期;仲春明的《中国的庙会市场》,载《上海经济研究》,1987 年第 5 期;赵世瑜:《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研究》,载《历史研究》,1992 年第 5 期;《中国传统庙会中的狂欢精神》,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1 期;王兴亚:《明清河南集市庙会会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刘克祥:《近代农村庙会及功能与作用》,载《近代史学刊》第一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4 年第 3 期;小田:《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载《中国农史》,2002 年第 2 期;《庙会特征小议》,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 年第 1 期;丁德超:《近代时期豫西北农村庙会市场研究》,载《古今农业》,2008 年第 2 期;王庆成:《晚清北方寺庙和社会文化》,载《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等。
②百泉《百门陂碑铭》,唐人孙去烦所书,武则天长安四年(704)九月立。

始扩大,太行山的药材大宗进入庙会市场。清代百泉庙会药材交易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会期延长到 10 余天。据乾隆《辉县志》载:“四月,百泉,初一日起,初十日止。四方辐辏,商贾云集,南北药材俱备。官弁督役,稽查窃匪。郡守于初八日致祭卫源神。”^[3]民国时期,虽然百泉庙会在四月初八取消了郡守祭祀卫源神的仪式,但是庙会开始时放“水鸭”的习俗保留了下来。所谓放“水鸭”,其实与放“烟火(爆竹)”相似,不同的是放“水鸭”是在水里燃放(由一只大鸭炸出许多小鸭)。

百泉庙会市场以中药材作为主要的交易物品,这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百泉北负太行山,南抱黄、淮大平原,山高泉甘,土地肥沃,河南及山西长治一带历来盛产中草药材;加上百泉庙会会期正值春季农闲季节,气候温和,不仅本地药材大量上市,而且外地药材也来此集散,享有“春暖花开到百泉,不到百泉药不全”的美誉,并与河北安国,江西樟树并称全国三大药材交流大会^{[4]206}。

二、百泉庙会的组织结构及会费来源

明清时期,在河南各级官府中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与官吏来管理庙会,但是庙会也有一定的组织和管理方法^[5]。会首(又叫社首、会长、会头、神头)是庙会的组织和管理者。天爷会会期较短,仅为 1 天;辐射范围有限,只是四周 30 里以内;交易人数也不多,不超过数千,除少数城乡一带的小本商人之外,完全是本地农民;为天爷会供给商品者多来自城关与西南及东南诸乡,需求者则多来自东北及西北诸地。按照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天爷会只能作为基层市场,没有严格的组织结构,只凭乡民习惯而已。

嘉庆九年(1804)药材大会订立了会规章制度,大会有了管理机构,开始有组织、有领导地持续发展^{[4]209}。民国药王会组织主要由本地与外地药商合组而成,乡公所职员亦以大会职员身份参与,是为与会药商服务的临时组织机构,大会结束后,由本村药帮会首主持日常工作,办公地址设在药王庙内。具体组成见图 1:本村会首是由药帮会首和乡公所职员组成,棚下会首是由老会首和值年会首组成。棚下会首指各地的大商号,由于在会上张幕施棚,棚下营业,故得其名,每年从中推选若干人作为会首,称值年会首。老会首均由广字号的山西太谷帮^①、本省的怀庆帮与彰德帮等实力最强的老商号担任。药王会的职责,一是解决

棚口间、药铺间、药摊间一切交易上的纠葛,如货物的真伪、货色的纯杂、斤称的大小等;二是负责交易货款的清算及会费的收取;三是负责召开各药行、大杂货棚会首会议,商议布置大会。

一、本村会首→(一)药帮会首——(二)乡公所职员

二、棚下会首→(一)老会首——(二)值年会首

图 1 民国时期药王会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 794 页。

至于药王会的组成人员数量,不是十分固定。据民国二十年(1931)丞庠《四月会调查》记载:“民国二十年的组织,尚不甚复杂,乃合 11 人所组成者。其内容如次:一、本村会首 5 人,分任下列职务:(一)书记 1 人,负文书、庶务、会计之责。(二)干事员 2 人,负对外联络与办交涉之责。(三)调解 2 人,负调解交易上之纠纷等责。二、棚下会首 6 人,内分:(一)老会首 4 人,与本村药帮会首同负结算货款之责。(二)新会首 2 人,负解决重大问题与办法等责。按照传统药王会的惯例,调解员须有本村村长任一员,同时本村村长可兼任药帮会首;近代以来的变化是书记和干事员须有村公所的人员担任。”^{[6]795}

民国时期百泉药材大会的组织机构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药王会之外,百泉药材大会的组织管理机关还有商务临时委员会,简称临时商会。1929 年大会期间,“还成立了临时商会,并订立会章,其中第二条规定:临时商会由县长、人民自卫团、公安局、造林局、商会和本村董事组成。其负责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安全,指导全会,保障会规”^{[4]217}。临时商会成立以后,改变了药王会单纯由药商主持大会的格局,他们增选了京货行、帛布行和杂货行的代表各一人参加领导机构,以期扩大各项物资交流。临时商会是有政府官员参加的临时权力机构,药王会是药商组织药材交易活动的团体,两个组织在大会期间分工合作。但在民国二十年(1931)药材大会上,改称为商警联合办事处,并邀请了当时河南省立民众师范学校及其校警队参加^{[6]794}。自从有临时商会以后,百泉大会由药材商主持大会的这一特点有所改变。

近代庙会的经费来源,江南主要为工商界资助、向社会各界募筹、庙产和会产等四个途径^[7]。相比之下,百泉药王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药行所缴纳的会费。会费依照药行的大小分为四等:甲等 3 元、乙等 2.1 元、丙等 1.2 元、丁等 0.7 元。山货挑担商不

^①广字号大小的山西药号,系指资本雄厚,能够远至广东一带贸易,此名号由此而来。

缴纳正式会费,但须购买会证,称为“小贴”,贴价 0.5 元^{[6]8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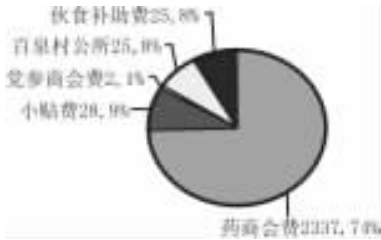


图 2 民国二十年(1931)药王会
各项收入示意图(单位:元)

注:此表系百泉乡村师范学校民国二十年(1931)调查所得。

资料来源: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 837 页。

从图 2 数据显示,可以发现:民国二十年(1931),百泉药王会的经费共 313.7 元,其中来自药商的会费即达 233.7 元,占药王会经费总数的 74%;小贴费占总数的 9%;百泉村公所和伙食补助费各占 8%;党参商会费占 1%。由此可以推断,民国百泉药王会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药材行商的会费,亦即经营药材类工商界的资助。

百泉临时商会的会费来源于商人的缴纳,亦按资本大小自数角至二三元不等。药商也为临时商会的成员,除向药王会缴纳会费外,还须向临时商会缴纳与前者等量的会费。这不仅说明了民国庙会组织控制力的加强,而且也许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市场在中心地功能等级中的地位越高,它的交易活动受官僚机构控制和征税的可能就越大。”^{[8]39} 百泉庙会的税捐,除了为临时商会和药王会而出的会捐和会费外,各商行还需缴纳印花税和向公安局缴纳一定的款项^{[6]805}。

三、百泉庙会的市场结构

百泉乡村有三条主干街道,俗称东街、南街、西街。支路只有一条,在东街中段之西,因为其中尚有许多岔道,可以往返周转,故名叫磨盘街。天爷会和药材大会都属于百泉庙会的组成部分,虽然二者所起到的市场功能差异很大,但是可以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

天爷会的交易市场布局较小,仅在南街全部及东街南段。天爷会作为一个基层市场,“其职能首先是为了满足农民的需求而交换他们的产品”^{[8]25}。因此天爷会上用以贸易的物品,大多是农家生产的产品或者是农民需要的商品。据民国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的调查,所有商品,大约可分为农事用具、家庭生活用品、家庭工业用具、教育用品及饮食游艺等五类^{[6]836}。

百泉天爷会有一个显著的市场特点,即具有一定规模的牲畜市场。如图 3 牲畜市场数量统计数据所示,天爷会的牲畜市场数量差异较大,反映了近代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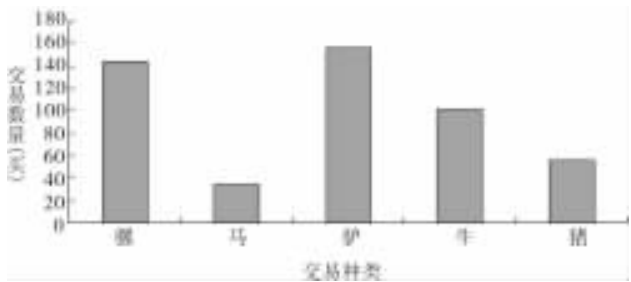


图 3 民国天爷会之牲畜市场交易统计图

资料来源: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 836 页。

南农民的部分消费偏好。一方面,骡、马、驴及牛是当时农民主要的畜力工具,因此百泉的大牲畜交易量比较丰富;另一方面,猪的交易量不是很大,只有大小猪 50 余头,可见百泉周围乡村家猪饲养业比较落后,仅供农民过节使用。关于百泉乡村家猪饲养业落后的原因,据时人调查发现,当地气候干燥亢旱,养猪容易患病,死亡率高;同时,近代河南农村经济衰落,农民习俗朴质节俭;再者,百泉多“无地少地农民,粮食与副产品收获甚少,无力养猪”^{[4]32}。可见,在生产效率低下的农村,一般乡民除了逢年过节是很少吃肉的。因此,天爷会作为一个基层市场,其市场作用主要是“为这个市场下属区域内生产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8]6},而这些贸易物品与河南的农家经济生活息息相关。

百泉药材大会市场布局按货类分区,东街是药货区,外地大药商搭棚放货营业,俗称棚口。磨盘街是京货区(因丝、绸、布多为机织,亦称洋货区)。南街是挂货区(挂货指五金类的钢、铁小件制品,如挂出营业的帐钩、锁钥等)。规模较大时会场超越村界,往北延伸到苏门山麓,向南常常越过马家桥,方圆约有 3 平方公里。具体来说:“入东街南门一段即百泉中学周围是农具区,顺延以至于南街;过南街口到合作社以北为土制、挂货、杂货区;复往北行,路西的磨盘街,是京货及洋货区;东街的乡公所以南至磨盘街,为南货药材区;再向北入于小麓荒郊,是山货药材区;棉织品如毛巾棉带之类,又在山货药材区以北;土布区则在山坡之列,布贩铺设地摊。乡间妇女则每人怀抱一二匹,或坐或立,以待买者。”^{[6]840}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民国百泉药材大会的鼎盛时期。参加药材大会的人数可达成千上万人之多,“每日会上的人,异常游移不定,其数很难计算,但凭估计,通常不下于 3000 人……若连在会的人也算在内,每日便有 1 万余人之谱”^{[6]791}。同时,药材大会市场的成交金额也是蔚为可观的,据民国十八年(1929)百泉药材会贸易统计,“货物交易总值 300 万银元”^[9]。百泉药材大会依商业的种类区分,称为行,如药材行、皮货行等;依商人籍贯区分,称为帮,如怀帮、陕帮等。民国以来,随着新式交通方式的出现,参加

大会的地区和商户日益增多。参加百泉药材大会各行帮的来源地,共计有 5 省 42 县。其中,以河南本省最多,共 27 县、587 家;河北居第二位,有 6 县、19 家;山东 5 县、10 家;山西 3 县、5 家;安徽 1 县、2 家^{[6] 338}。可见,百泉庙会与华北各地的市场联系比较紧密,其贸易覆盖范围已经延伸至邻近省区,扩大了农村市场

的交易区域,一定程度上沟通了省际贸易联系。

百泉药材大会市场的交易品种以药材居多,据民国二十三年(1934)调查记录:“会上交易 80% 为药材,15% 为洋杂货,5% 为农具。”^{[4] 227}另外,药材大会的交易品种还可以从百泉药材大会的行帮数目反映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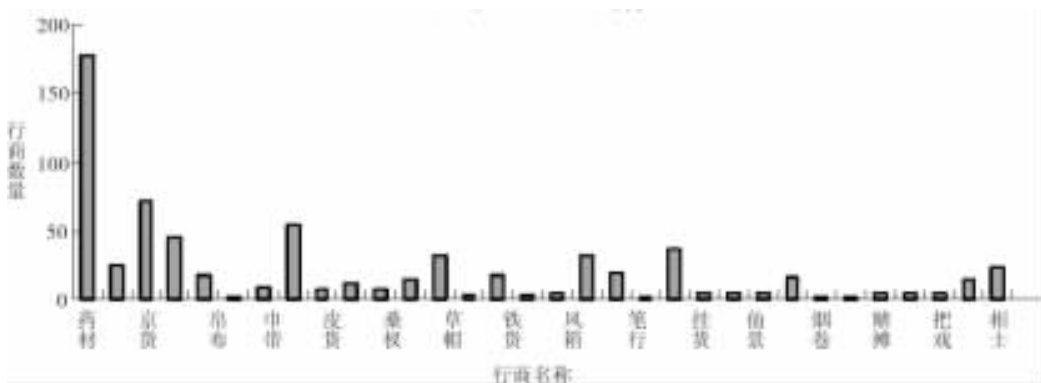


图 4 民国百泉药材会行商数量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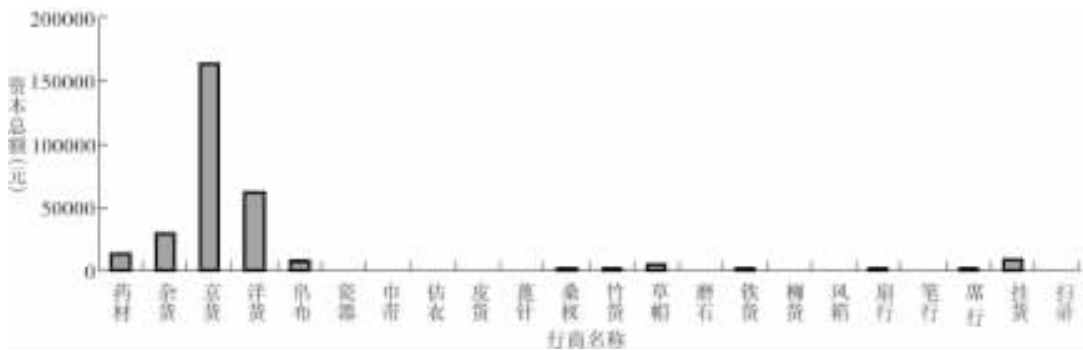


图 5 民国百泉药材会行商资本数量示意图

资料来源: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第 800、804 页。

从图 4、图 5 可以发现:第一,药材会行商数量繁多,主要有 34 行、961 家,其中以药行数量为最多。药材行数居多的原因在于药材会的主要项目即是南北药材的对换,主要的交易品种以药材、京货(绸缎、机织布)两大行业为主。第二,药材会行商资本总额构成以京货、洋货资本最为雄厚,这些行商主要经营绸缎和机织布匹的贩卖,表明以百泉为代表的河南庙会市场已成为近代机器工业制成品或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市场。第三,民国百泉药材大会的行帮组成已经有了新的成员,比如照相、烟卷等近代工业产品也渗透到河南庙会市场,同时,药王会还出现有经营刻字、铁货、磨石、麻绳等行商,“这些专门活跃于庙会的各类艺人和民间手工匠人,也说明了乡村庙会成为乡村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0]。第四,百泉药材大会不仅有杂货、竹货、草帽等与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相关的物品,而且还有说书、把戏、照相等精神产品和消闲用品,而对于地方上层有文化的人来说,原本“只有在中间市场而不是基层市场上才能买到书和

文具”^{[8] 35}。这些数据不但反映出药材大会具备“城镇经济”的贸易特点,而且也展示出药材大会具有中间市场的特征。除此之外,图 4、图 5 中行名所属的商铺大多是行商,而行商比例之高决定了百泉药材大会的市场类型属于中间市场,因为“行商对中间市场体系比对于更大的、层次更高的市场体系更为重要”^{[8] 37}。总之,百泉药材庙会市场井井有条,它以商品贸易的形式,展示了民国河南乡村商品经济发展的面貌,反映了社会分工的细密,以及农民与市场联系的增强。

四、百泉庙会在区域市场体系中的作用

庙会市场作为农村定期市场之一,是区域商品流通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庙会市场在民国河南地区的作用仍是不可忽视的,其在沟通城乡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保证小农经济生产与再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区域整体市场体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众所周知,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都会影响当地庙会市场的发育程度。但是,即使处于同一个地区,相同的发展程度,其庙会市场的发展程度也会相差甚远。百泉庙会的两种形态即是鲜明的例子。

百泉位于太行山浅山丘陵向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由于历史地理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其内部农村庙会的发育程度也是截然不同的,天爷会和药材大会就是典型的案例。按照施坚雅的市场理论,天爷会只是起到了一个基层市场的作用,而药材大会却发挥出了一个中间市场的作用。无论是天爷会还是药材大会,其都是农村定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岁市或年市^{[6]312}。天爷会和药材大会二者虽都属庙会市场,但其性质是有所不同的。从经济史或社会史的视野来看,二者代表民国农村市场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天爷会是农村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天爷会是百泉较为盛大的农村市场,但其本身贸易的规模及其程度决定了其属于“农村初级市场中心地的补充部分,与主要联系区域市场的市镇相比,庙会主要以服务本地为宗旨”^[11]。民国河南农村的庙会,类似天爷会的庙会比比皆是。林县早在乾隆时期(1736—1795),就有天爷会一样的庙会:“古有社以会万民,近俗为香火会,以祈以报,以敬事神,且因以立集场,通商贩。”^[12]信阳,每年四月初八的浴佛,“贤山向有会,香火极盛,小商贩麇集,所有农具、家用物品,一切取给焉”^[13]。诸如此类的乡村庙会,则多生产、生活必需品,实用性较强^[14]。但是像百泉药材大会所表现的中间市场经济特征,与之类似的庙会在民国华北平原存在的数量比较稀少。作为一个药材交易的中间市场,百泉药材大会的重要作用在于交流和调剂药物,北药南调,南药北运,互通有无,调剂余缺。1931年百泉庙会有“西南货(云、贵、川、鄂、湘、赣等外地药商到会上出售的药材)共计393种,山货药材(太行山区所出产的上货药材)有62种”^{[4]227}。据民国《四月会调查》显示:“每次会上货币流通的总数,平常是在100万元左右,最多曾经达到300万元的数目。”^{[6]791}可见,无论是从百泉庙会的贸易规模和交易数额,还是庙会的繁荣盛况,都不是一般华北乡村庙会市场所能比拟的。

近代以来,随着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华北地区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也日益加深。由于百泉药材会的兴起,“太行山的丰富药材每年在此集散,对民间采集药材有很大促进”^{[2]1}。怀庆府所在的地区是华北中药材的重要产地,百泉紧邻怀庆府,驰名中外的四大怀药——生地、菊花、牛膝、山药,更是外地药商抢手的热门货^[15]。可见,百泉庙会的药材集散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百泉周围地区药材的商品性生产,药材的大量生产也为百泉药材集散市场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货源。同时,百泉庙会的兴盛也直接扩大了附近村民的收入来源。百泉庙会期间,“药材来到百泉村,卸货是百泉人的特权,并有一定的规矩,每件1500文,决无周转错误之弊的”^{[6]308}。每年百泉药材大会,“东街两旁市房,共约600余间,大平均系专为大会而建,会期前后,十室九空,平时用以拴牲口、堆畜粪,及至会期,则均租出无余,每间租价约四五元。除原有房屋之外,旷场亦多占用,用以张幕设棚,其租价系以门面之长度为准,每尺约1元。村中原有居民届时多将所在房屋出让,自己赶赴乡间亲友处暂时寄居,或至原野张幕”^{[6]338}。据调查,建国前百泉附近村民在药材大会期间的经济收入可以顶住一个麦季^{[4]4}。可见,百泉庙会激发了附近村民的商品意识,活跃了百泉附近的农村市场。

总之,百泉庙会作为农村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的河南农村市场体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贸易功能已超过了其娱神功效,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了与同时代的华北地区乡村庙会市场所共有的特征,但又呈现出了一些地方特色。

参考文献:

- [1] 小田. “庙会”界说[J]. 史学月刊, 2000(3).
- [2] 辉县史志编纂委员会. 百泉药材会志[M]. [出版单位不详], 1986.
- [3] [清]文兆璠. 辉县志[M]. 卷4. 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 [4] 崔灿. 百泉村志[M]. 北京: 中国电视广播出版社, 2002.
- [5] 王兴亚. 明清河南庙会研究(一)[J]. 天中学刊, 1995(1).
- [6] 李文海.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中)[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 [7] 小田. 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7(2).
- [8] [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史建云, 徐秀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9] 辉县志编纂委员会. 辉县志[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2: 567.
- [10] 宁欣. 乡村的庙会与庙市[J]. 文史知识, 2007(1).
- [11] 徐浩. 清代华北的农村市场[J]. 探索与研究, 1999(4).
- [12] [清]杨潮观. 林县志[M]. 卷5. 乾隆十七年刻本.
- [13] [民国]陈善同. 重修信阳县志[M]. 卷17. 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
- [14] 赵世瑜. 狂欢与日常: 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 200.
- [15] 秦启安. 百泉药材交流大会[G]//辉县文史资料: 第一辑. 1990.